

錫釉陶的故事

施靜菲、王淑津、彭盈真

奧利佛·華森博士到訪國立故宮博物院的第二場演講，介紹九世紀初錫釉陶在伊朗製作後，擴散至伊斯蘭世界與歐洲大陸的歷程——一則長達數百年，跨越歐亞大陸的「錫釉陶的故事」。

錫釉陶的起始

華森博士（Oliver Watson）先前提到，在七世紀以前中東地區的唯一施釉陶器——孔雀藍釉陶器，作為盛裝棗蜜的容器運銷到亞洲各地，印度、東南亞、中國及日本，顯示伊斯蘭統治下產業製作中心及重要港口之間的貿易交往情形。從東方帶回來的香料與絲綢等，當然還包含我們特別關心的陶瓷，這些來自東方的商品從波斯灣往北運送到伊拉克南部巴斯拉（Basra），然後再以陸路運送到其他伊斯蘭世界。

約自九世紀初開始，從模仿進口的中國唐代九世紀白瓷入手，伊斯蘭地區開始製作看起來像唐代白瓷的不透明低溫錫釉陶器。因為材料及技術的限制，雖然無法製作像中國白瓷一樣胎釉燒結堅硬的



圖一 九世紀伊斯蘭錫釉彩陶碗，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圖二 伊斯蘭十世紀錫釉彩陶仿中國白瓷花口盤
丹麥哥本哈根David Collection藏（華森博士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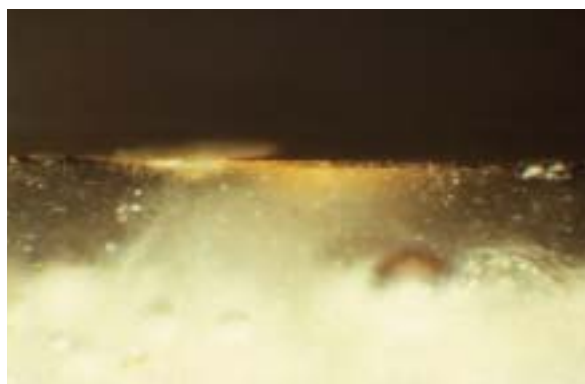


圖三 錫釉藍彩盤，德國柏林伊斯蘭博物館藏。由於阿拉伯文的書寫習慣是由右至左，因此銘文裝飾有時佔據畫面一邊，是伊斯蘭裝飾藝術中罕見的不對稱圖案。

瓷器，但是在器型及細節如敞口、玉璧形足等特徵，都仿製的唯妙唯肖（圖一）。陶工們盡量使用較白的黏土，但通常偏黃色調，因此需加上厚重的不透明錫白釉，以掩蓋不夠白的胎色。錫的氧化物使釉色不透明，燒成以後即是「不透明白釉陶器」或稱「錫釉陶器」。

當地仿製中國白瓷碗的作品有多種器型，有敞口、唇口（參見圖一），還有花口者（圖二）。另外還有

一類中國製作的類似白瓷器型，但加上綠彩斑裝飾，這類作品亦被模仿，出現在當地。我們可以看到伊斯蘭陶工逐漸擺脫對中國陶瓷的依賴，在器型及裝飾都開始本地化。隨後，伊拉克南部巴斯拉陶工也嘗試以鈷藍彩裝飾，他們使用來自伊朗中部的鈷藍料書寫銘文（圖三），或是繪製當地的卷草紋裝飾，這些紋飾完全來自伊斯蘭世界，器型也來自當地的金屬器。這種在錫釉陶上施加鈷藍彩的釉中彩裝飾，紋飾通常很簡單，因為鈷藍料是彩繪在尚未入窯燒造的粉狀釉上，滲透性很強，像是在雪地中的墨水，或是在報紙上作畫。（註一）至十世紀結束以前，以釉中彩裝飾的不透明白釉陶的製作技術，已擴散至西方的西班牙，東及中亞的撒馬爾干



圖四 薩發維德 (Safavid) 王朝虹彩陶器斷面顯微照片 (華森博士提供)。



圖五 九世紀伊拉克虹彩陶碗，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裝飾有特殊的放射性卷草紋。使用含銅量高的彩繪顏料時，燒成效果很不容易掌控。



圖六 九世紀伊拉克花卉幾何紋盤，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Samarkand) 等地區，橫跨數千公里，不過此時或許不會再有人意識到其源頭，乃發軔自九世紀陶工對中國陶瓷的模仿。

閃耀的虹彩器

除了釉中彩的裝飾發展外，錫釉陶另外一個更戲劇性的發展是虹彩器 (luster ware) 的誕生。這是一種經過二次燒成的釉上彩裝飾 (彩繪圖案在燒成的錫白釉表面) 陶器，用一層非常薄的金屬顏料塗繪在錫白釉上，幾近完美地呈現紅色、金色及銅紅色，製作技術相當困難而昂貴。虹彩裝飾技術開始

時只在伊拉克製作，十世紀時隨著陶工的移動將技術傳到埃及，有些弗利特陶器 (frit ware) 也以這種新傳入的技術加以裝飾。

從顯微照片中我們可以看到非常薄的一層虹彩在釉的表層，而且很容易脫落 (圖四)。虹彩有時候與鈷藍顏料出現在同一件器上，代表兩種顏料是在同一作坊中使用。下一階段，有棕褐色與金色複合色調的作風 (圖五)，而以銀當做呈色劑的顏料在燒製比較容易被掌握。裝飾結構有幾種基本的形式，通常採幾何式裝飾，或是把卷草紋和分隔區塊加以組合而成的緻密圖案 (圖六)。相同的圖式也可見於

同時期的銀器、手稿插畫、壁畫，或是建築上的裝飾（圖七）。從出土的破片中，我們看到虹彩器有相當豐富的圖案，且保存情況較傳世品好。十世紀結束前，虹彩器從棕色與金銀，簡化成以主要一種顏色為主來裝飾，即金褐色（gold-brown）（圖八）。



圖七 伊朗尼夏布爾(Nishapur)遺址建築壁畫上的裝飾，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伊拉克的虹彩器製作在十世紀末期停止，生產隨後轉移到埃及，有更多自然寫實的圖案（圖九），但仍然是模仿之前中國進口白瓷的器型，而且利用相同的材料及技術。但是此時的陶工及消費者是否還記得它們與中國的關聯？或者它們已被認為是地方傳統的一部分？埃及虹彩錫釉陶製品的多樣風貌（圖十），也正反映了該地自古埃及，歷經古典羅馬時期、哥普特（Coptic）基督教會、伊斯蘭教不同階段的歷史歷程，以及一個混融的社會。

錫釉陶及釉中彩的持續發展

讓我們再回到錫釉陶及釉中彩的故事。鈷藍彩繪裝飾陶器及虹彩器只發生在伊拉克南部，可能都



圖八 十世紀伊拉克人物紋四耳罐，美國弗利爾藝術博物館藏。



圖十一 伊拉克錫釉盤在鈷藍輪廓線內填以黃、褐、綠彩。巴黎羅浮宮藏（華森博士提供）。



圖十二 九到十世紀伊朗綠釉盤（產地可能為東伊朗的尼薩普爾），科威特國家博物館藏。綠彩斑搭配錳黑色銘文，而非鈷藍彩，品質也不若伊拉克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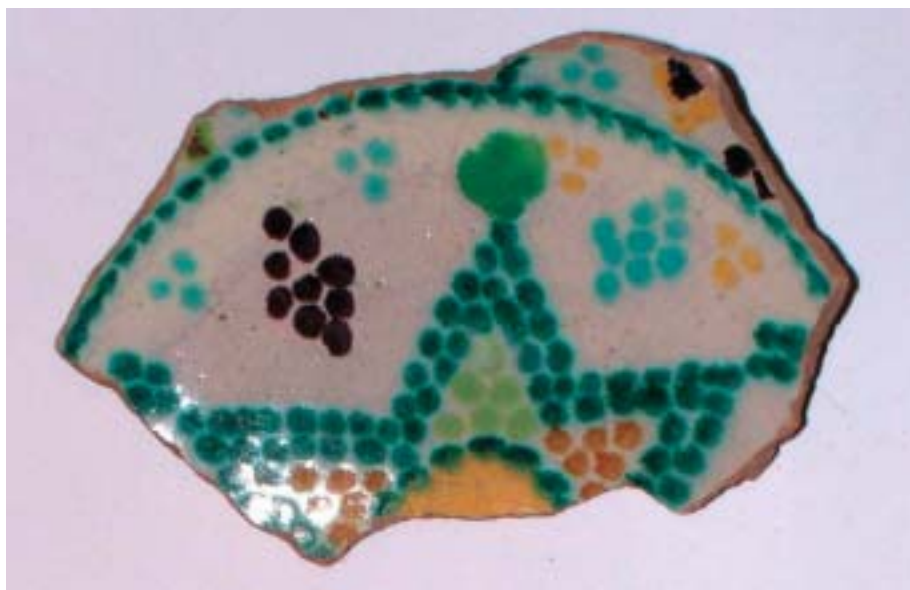
圖十四 中亞撒馬爾干彩釉陶。德國柏林伊斯蘭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圖九 十一世紀埃及虹彩製品，出現半獅半鷲的怪獸或兀鷲（Griffon）鷹狀標幟等自然主義的描繪母題。埃及伊斯蘭藝術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圖十 十二世紀早期埃及虹彩陶碗，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裝飾有歌普特（coptic）基督教士。這件作品其實已經是弗利特陶器（fritware）的早期形式，弗利特陶器將錫釉彩陶器的故事帶向另一個發展。



圖十三 十一至十二世紀埃及錫釉彩陶，能掌握更多顏色，這種類型的錫釉陶數量很少，但對於後來歐洲錫釉器的发展有關鍵性的影響。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在巴斯拉製作，然後銷到廣大的市場。但是錫釉及釉中彩的技術卻傳遍整個伊斯蘭世界，至十世紀末，已經傳布到從西班牙到中亞的廣大區域。各地區製品風格雷同，有時難免無法確切辨識產地。

今伊朗或北非或埃及，但是觀察裝飾風格與製作技術，仍可比較區域性差異。例如：伊拉克製品以鈷藍輪廓線填以黃、褐、綠彩（圖十一）；伊朗尼薩普耳（Nishapur）綠釉盤款銘紋以錳黑而非鈷藍料寫就，但品質沒有伊拉克製品好（圖十二）。在埃及，經常以錳呈色的褐或綠色率意描繪。而西班牙的製品，現存狀態大多不佳，因其彩釉在墓葬中褪色消失所致。此外，十一、十二世紀，在埃及發展更多種顏色的彩釉（圖十三），且控制更佳，這種陶器鮮為人知，但是對於往後歐洲錫釉陶的發展非常重要。而遠在往東數千里之外製作的中亞撒馬爾干彩釉陶，成分極為不同，其銅綠屬於鹼性釉，並非鉛釉（圖十四）。

九世紀時起源於伊拉克巴斯拉的仿中國白瓷的錫白釉陶，此時已經過三百年的發展，相同的技術跨越數千公里，從西班牙到中亞的薩馬爾干。現在它們的中國起源或許已經無法被辨識，但是與中國輸入的八世紀陶瓷及當地的仿製品之連接是無法被抹滅的。

歐洲的錫釉陶

——馬約利卡（Maiolica）與法揚斯（Faience）

現在我們看到的西班牙錫釉陶，距離中國開始發錫釉陶的時代已經很遙遠了。從十三世紀的虹彩裝飾開始，十四、十五世紀以後西班牙的錫釉陶發展已具備主導性的力量，並且輸出到伊斯蘭世界



圖十五 十五世紀初西班牙虹彩船紋陶碗，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十六 十五世紀西班牙虹彩徽章紋雙耳陶瓶（華森博士提供）
很難想像我們到此時看到的都還是同樣材料與技術的錫釉陶，但事實上，這就是由伊拉克一路傳布到地中海北岸的錫釉傳統之延續發展。

與歐洲，經典名品有船紋鉢、雙耳瓶等（圖十五、十六）。西班牙是基督教與伊斯蘭勢力交會的地方，當基督教在一四九二年成功驅逐穆斯林勢力時，帶有伊斯蘭風的錫釉陶器卻轉化為歐洲的奢侈商品，這就是所謂的西班牙錫釉陶器（Hispano-Moresque ware）。

馬約利卡原係港口名，大部分西班牙錫釉陶器就是經此港口流入義大利，隨著西班牙錫釉陶風格擴散至法國、義大利、荷蘭、德國、英國等地，遂成為陶瓷品類的代名詞。法國有許多錫釉陶製作中心，較早時是由南方往其他地區傳布，以法揚斯（Faience）之名為人所知，而Faience的得名可能是來自十六世紀義大利最重要的錫釉陶生產中心法恩札（Faenza）。義大利的錫釉陶製作技術較西班牙更

為精良，但是技法仍然使用釉中彩（圖十七、十八）。文獻資料顯示許多義大利錫釉陶工移民到法國南部創立工作坊，並且在當地經常獲得地方貴族邀請贊助（圖十九）。

十六世紀時荷蘭德爾夫特（Delft）亦開始生產錫釉陶，至十七世紀開始採用歐洲器型及主題圖案，但搭配此時期輸入的中國青花瓷紋飾，經常成為慣例（圖二十、圖二十一）。十八世紀時，錫釉陶生產隨著荷蘭陶工到英國，展開英國的錫釉陶製作。此時，距離九世紀伊朗陶工模仿中國陶瓷、發展鈷藍釉中彩繪技法的時間，已是超過九百年的歷史了。但是，十八世紀在英國與歐洲其他地區，以鈷藍釉中彩繪技法模仿當時從中國輸入的青花瓷（圖二十二）仍然持續流行。



圖十九 十六世紀法國法揚斯 (Faience) 錫釉陶扁壺



圖十七 十六世紀義大利錫釉陶製品，風格仿自西班牙的虹彩與鈷藍裝飾。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圖十八 1532年款義大利馬約利卡陶器，波隆納中世紀博物館藏。此時陶工對彩釉的掌握已相當成熟。

問題與討論：

錫釉陶的風格擴散與伊斯蘭陶瓷款銘、幾何紋飾意義等問題

(1) 泰北出土白釉綠彩器的年代與產地問題

華森博士第二場演講敘述錫釉陶的風格傳播，隨著伊斯蘭陶工的移民，以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等地為中心，至十二世紀結束前，逐漸擴散至北非、埃及、敘利亞，甚至往東到中亞撒爾馬干等廣大的腹地，稍後更傳播至西班牙、義大利等歐洲各地。針對錫釉陶的擴散問題，與會人士提問近年日

本學者所研究的一群泰北出土的白釉綠彩瓷資料，或可納入這個風格擴散圈來加以考量。該群白釉、綠釉與白地綠彩製品，以碗、盤形



圖二一 英國十八世紀錫釉陶單把罐。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華森博士提供）。

器為主，少見壺、瓶形器。一九八四年，在泰國、緬甸國界附近Tak、湄索Mae Sot、Um Phang 這個三角地帶遺跡發掘出土。遺跡的性格眾說紛紜，或謂戰亂時之窖藏、或謂交易之據點，或謂墓地。雖然墓地之說法較具說服力，但是除了陶瓷器、銅劍與念珠等遺物以外，並未發現人骨，因此無法證實。該群標本的煉瓦色胎土質地鬆軟粗糙，含鐵分高、底部多露胎，使用含錫的低火度釉做出白濁感的白地風格，釉藥質感近似部份伊斯蘭陶器、義大利馬約利卡陶器、荷蘭德爾夫特陶瓷。再加上團花鳥魚主題紋樣與蔓唐草地紋，簡略素樸的表現近似伊斯蘭風，據說當地人稱這種綠彩陶器叫阿拉伯風（Arabia）。

基於風格的一致性，日本學者認為該批製作的製作時間非常集中，而且根據伴隨泰國與中國陶瓷



圖二 十八世紀荷蘭德爾夫特錫釉陶藍彩花鳥紋鬱金香花瓶，阿姆斯特皇家博物館藏。高達兩公尺的荷蘭鬱金香瓶插，可能是最精緻的錫釉陶製品。

器編年，推測其年代約在十五、十六世紀之間。其釉藥成分經日本文化財研究所江本義理分析，鉛佔50%至60%，錫佔3至5%，屬於錫白釉、錫綠釉系統，為東亞未曾使用過的特異釉藥，推測可能與伊斯蘭錫白釉傳統有關。但是基本上全體的形貌與底部削圈足的方式，與中國、歐洲以及中近東都很不一樣，究竟確切產地何在向來是個謎。最近，日本學者津田武德、佐佐木達夫在緬甸北部的遺址調查顯示，該地即是白釉綠彩器的生產地。^{〔註一〕}

由於該批陶瓷標本主要收藏於日本，華森博士並不熟悉，因此該項資料補充了伊斯蘭錫釉陶風格擴散圖的一個重要生產結點。筆者推測，這或許亦是未來探索東南亞區域陶瓷生產與伊斯蘭及中國陶瓷文化圈互動關係的一個可能起點。

(2) 伊斯蘭陶瓷的銘款內容與幾何紋飾的圖像意義

另一個提問重點在於，伊斯蘭陶瓷上面銘款包括那些內容，如陶工、工場（workshop）或者贊助者姓名等？這些銘款是否提供了陶瓷製作工業或者社會贊助關係的可能線索？此外，伊斯蘭陶瓷器物經常可見六星芒、八星芒或十二星芒團花等幾何紋飾或符號，是否具有特別的圖像意義？華森博士提到，有些九世紀的錫釉陶器上確實書寫了文字，不過大部分難以辨識，這些文字不只是在器底，也有寫在器表，成為重要裝飾的例子。至於星芒狀幾何紋飾，華森博士比較傾向於認為它們僅是風格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未具備有圖像上的文化意涵。

小結

近年台灣的熱蘭遮城遺址也出土歐洲的錫釉陶器容器破片，詳情請參見本期月刊謝明良教授的文章。這似乎就如同華森博士在演講結尾時所作的結語，最早由模仿來自東亞中國的白瓷開始，傳布到整個伊斯蘭世界及歐洲，到最後歐洲用同樣的錫釉陶技法模仿十七、十八世紀由東亞輸入的中國及日本陶瓷，之間糾葛纏繞的關係又繞回原點，而我們在台灣及日本發現的荷蘭錫釉陶，又似乎為這漫長的錫釉陶故事增添了一個註腳。

註釋

一、有關伊斯蘭藍彩裝飾陶器與九世紀中國「唐青花」的討論請見施靜菲、王淑津、彭盈真，《伊斯蘭陶瓷的主流發展與一些有關交流的發想》，《故宮文物月刊》二八三期（二〇一六年十月），頁七八八。

二、日本歷來學者有關此項議題的研究，包括長谷部樂爾，《傳タイ西部出土白釉綠彩陶器の釉薬について》，《陶說》三九九號（一九八六年六月）；町田市立博物館編集，《國分孝雄コレクション タイ・メソット出土 綠繪のうつつわ》，東京：町田市立博物館，一九九六。佐佐木達夫、野上建紀、佐佐木花江，《ミヤンマー窯跡踏査と採集陶磁器》，《金沢大學考古學紀要》二七（二〇一四年），頁一四七—一四六。

更正啟事：

二八三期〈伊斯蘭陶瓷的主流發展與一些有關交流的發想〉更正

圖三 九世紀中國北方白瓷製品大量輸入中東。（黑石號沉船出土，陳玉秀提供）

圖四 英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藏

圖九 英國牛津大學愛荷莫林博物館藏